

欧洲移民群体激进右翼政治立场比较研究

朱炳坤

(燕山大学, 河北 秦皇岛 066000)

摘要: 基于近年世界价值观调查(WVS)中欧洲11个国家的样本,采用福利沙文主义、移民影响评估和激进右翼政党支持度三项指标,运用倾向值加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欧洲第一代及第二代移民与本地居民在移民态度上的差异。研究发现,移民及其后代在福利排斥倾向、对移民影响的负面认知以及激进右翼政党的支持度上均显著高于本地居民;进一步分析表明,低教育水平与年长移民的排斥性更强,而高学历年轻移民的态度则相对更为开放。

关键词: 欧洲移民;福利沙文主义;激进右翼政党

中图分类号: D750.8; D5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9499(2025)12-0151-05

在欧洲国家中,移民问题在最近的国家议会和地方议会选举中成为了选民和政客们共同关注的焦点议题。然而,与公众和政治家对移民问题的广泛关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移民群体内部对其他移民的态度如何,以及这些移民群体是支持还是反对移民,是对移民持同情立场还是表现出排斥情绪的问题,尚未得到深入研究和系统探讨。

一、研究状况

现有关于欧洲移民的研究着眼于移民对本土经济造成的影响。理论上,来到欧洲的移民对具有相同受教育或技术背景的本地人就业产生不利影响。因为移民增加了具有相似能力水平的劳动力供应,即在劳动力需求不变的情况下,移民的到来将加剧就业竞争并导致原本岗位薪酬下降^[1]。现实中,外来移民获得职位相较于拥有相似教育和技能水平的本地人更低,因此移民的就业对本地人口就业的冲击表现出一种社会职业层级上的“错位”。而且,本地居民倾向于专门从事依赖本土语言技能的工作,外来移民在这些就业领域实际上并不一定能够对本土移民的就业造成实际的影响^[2]。另一部分研究重点在于本地人对移民的态度,学者们认为本土民众对移民的态度直接影响了民众在选举中的投票倾向。这些研究结果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逻辑链条:(1)外来移民与本地居民在就业、福利领域存在诸多竞争,同时移民带来的异质性文化对本土文化形成了冲击;(2)因此,欧洲的本土居民对外来移民心怀怨恨;(3)加之欧洲传统左翼政党对外来移民的照顾;(4)欧洲本土居民选择支持激进右翼政党以实现将移民从本国排挤出去的目的。

当下,关于已经在东道国家定居的移民如何看待其他移民的研究依然十分匮乏。从直觉出发,人们可能会认为移民都会支持移民,因为移民在国外可以通过相互支持的方式强化群体认同。但事实与直觉存在出入。正如美国拉丁裔在2016年和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对特朗普的投票支持,说明了外来移民

可能支持反对移民的候选人及其政策立场。英国苏纳克时期内阁的内政大臣苏拉·布雷弗曼(Suella Braverman)其作为有南印度血统的来自肯尼亚的移民二代,认为英国的移民政策过于“拘谨”,^①英国政府应该严格限制外来移民。因此,从现实出发,一国内的移民对外来移民的看法是十分复杂的。现有关于移民的研究对此给出了一定的理论解释,即先前定居移民所处的经济社会收入阶层越高,其反对受教育水平低的非法移民的可能性越高。这份研究认为,美国、亚太、加拿大还有新西兰几国的高经济阶层的移民会认为移民会增加犯罪率,提升本国受到恐怖袭击的可能性,让当地的失业率上升并制造社会矛盾^[3]。但论文中所应用的数据并没有对欧洲移民如何看待移民这一问题做出进一步解释,留下了讨论空间。

欧洲移民的政治态度是复杂多变的。一些研究认为,欧洲移民倾向于更多地支持左翼政治立场而不是中右翼政治立场^[4]。从经济利益角度出发,来到欧洲的移民需要更广泛的就业机会和福利待遇,欧洲左翼政治往往对移民的就业和福利要求持有开放态度,因此更受欧洲移民们的青睐。从文化角度出发,移民的来到意味着社会中存在更根本的文化分歧。德国、法国以及荷兰的右翼保守政党会选择单一文化立场,试图保护本土社会文化的同质性,以抵御移民带来的文化多样性的浪潮。而左翼政党既接受文化变化,又支持外来移民群体的利益诉求,移民选择左翼政治立场也顺理成章。

但欧洲移民未必一直都倾向左翼政治立场。时间来到21世纪,关于欧洲移民的研究显示,选择支持激进右翼政治意识形态的移民不仅不反对排斥移民的政策,甚至有可能完全支持它^[5]。原因在于,先来到欧洲的移民可能会感受到来自其他晚些来到欧洲移民群体的经济竞争压力,尤其是在移民所选择的国家针对移民投入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移民之间在就业、福利等方面的竞争会加剧。激进右翼政党通常将来到欧洲的移民定义为“外来群体”(Out-Group),并将其描述为对本地群体的经济威胁,从而吸引了那些感到威胁的移民群

①<https://www.bbc.com/news/uk-politics-66999209>.

收稿日期: 2025-10-19

基金项目: 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欧美国家工人阶级转向激进右翼政党动因研究”(HB23GW004)

作者简介: 朱炳坤(1992—),男,吉林省吉林市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激进右翼政党、当代激进政治与政治科学方法研究。

体的支持。上述“移民反对移民”的情况说明了来到欧洲的移民在融入本地社会时，可能会拒绝认同“移民”这一群体身份，选择将自己视为某种意义上的“本地人”，进而这些移民可能会接纳排斥外来移民的激进右翼政党的意识形态与政策主张。因此，那些具备移民身份认同或移民背景的群体有可能持有排斥移民的立场。一项关于欧洲移民的访谈调查显示，接受访谈的移民群体确实将移民视为对瑞典社会的社会经济威胁。研究人员通过现实冲突理论的进一步分析得出结论，尽管将移民视为社会经济威胁并不是移民选择支持激进右翼政党的唯一原因，但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原因^[5]。对于那些尝试融入欧洲主流社会的移民来说，排斥移民的激进右翼意识形态为其提供了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

基于上述经济学和政治学关于移民态度的研究，本文认为来到欧洲的移民可能会对移民持负面的排斥看法。移民对移民的排斥可能更多地来源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而非个人所处的社会阶级与经济条件，即其核心在于“文化无知和偏见”(Cultural Unawareness and Prejudice)^[3]。在此假设下，本国居民对移民群体中每个单独的个体特性的了解有限，他们将所有移民的特性归纳为一个“平均的移民”形象^[3]，而这个“平均的移民”形象影响了本国居民生活质量与发展机会。与此相对，移民群体对移民，尤其是与其同一来源国的移民有更深入的了解。当移民认为某些新移民的涌入会降低本国居民对移民整体形象的看法时，他们可能会采取反移民的立场，尤其是那些在社会中已经成为精英群体的移民。而这些移民群体往往会通过反对新移民来与本国居民建立认同感，以此维护他们在本国社会中的地位。这种反对移民的态度尤其在非法移民较多的国家表现得更加显著，而在有选择性移民政策的国家中则不明显。

二、数据与方法

本文选择了世界价值观调查2017—2022年欧洲部分的数据。其中包括了奥地利、德国、芬兰、法国、丹麦、意大利、挪威、荷兰、瑞典、瑞士和英国11个国家，共计14 719个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各个国家案例占比如表1所示。

表1 各个国家案例占比

国家	各国家案例占比	各国家移民占比
奥地利	5.6%	9.6%
瑞士	15%	21%
德国	12.2%	9.6%
丹麦	9.4%	7.3%
芬兰	5.7%	0.5%
法国	5.5%	8.3%
英国	17.9%	12.3%
意大利	3.8%	1.2%
荷兰	13.6%	6.2%
挪威	5.9%	9.5%
瑞典	5.4%	10.6%

本文选择了如下几个结果变量用以说明移民对移民的看法。首先，福利沙文主义(Welfare Chauvinism)是移民研究中常用的概念，指的是本土居民出于自我保护的动机，认为移民对福利资源的分享不公，因而主张在社会福利的分配上应优先照顾本国居民。福利沙文主义在西欧和北欧国家尤为普遍，并且常常成为激进右翼政党动员选民的关键议题之一^[6]。为了测量这一现象，本文选择了“相较于移民，雇主应该给予本国居民更多的就业优先权”作为结果变量。选择此项作为衡

量福利沙文主义的变量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因为就业优先权直接关乎每个个体的经济安全感，同时也是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中被排斥的重要体现。

其次，移民对本国的具体影响是衡量移民对东道国发展直接与间接作用的综合指标。移民的到来不仅在经济层面引发劳动力市场、福利系统的动态变化，还可能通过文化和社会整合过程改变本国的社会结构^[7]。研究表明，移民往往带来文化多样性，同时也伴随着文化摩擦和社会张力，进而影响了公众对移民群体的整体看法。为了衡量这一复杂关系，本文采用了“如何评价移民对你所在国家发展的影响”这一指标。

最后，激进右翼政党在移民议题上的政治立场及其影响力已成为欧洲政治环境中的重要现象。近年来，激进右翼政党的崛起不仅重塑了移民政策讨论的格局，还深刻影响了主流政党的竞选策略^[8]。这些政党往往以反移民、排外和民族主义为核心动员策略，并通过将移民问题与本土居民的经济困境挂钩来吸引选民。因此，本文将激进右翼政党在11个国家的投票选择编码为1，其他政党为0，作为衡量选民政治倾向的结果变量。

本文旨在探讨欧洲国家中移民群体对其他移民的态度差异，核心的解释变量为移民身份。通过分析不同代际移民群体在对移民的看法上的分歧，本文希望揭示移民身份与文化背景如何影响移民对他者移民的态度，并探讨这一现象的潜在社会学与政治学机制。从理论上来看，移民身份(Immigrant Identity)是一个复杂且多维度的概念。移民身份可以从行动和结果两个层面进行理解。从行动层面来看，移民是指个人或群体由于各种原因从一个国家或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国家，并在目的地进行长期定居的过程^[9]。这一过程通常伴随身份认同、社会网络及文化适应等多个维度的动态演变。从结果层面来看，移民身份意味着个体在迁移之后获得特定的法律和社会身份认定，如合法居留权、工作许可、永久居留或入籍资格^[10]。因此，移民身份不仅是一个法律和政治范畴的问题，更包含了文化认同、社会整合和代际传承等复杂议题。

在本文的研究中，移民身份的核心定义依据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的数据——即受访者是否出生于该国(出生地)作为移民身份的主要判断标准。这种定义虽然在法律层面较为简单，但它能够有效区分第一代移民(即未在东道国出生)与非移民群体。此外，为了更全面地捕捉移民身份的复杂性，本文还引入了父母的出生地信息来衡量第二代移民(即父母至少一方为移民，但本人出生在东道国)的身份背景。

移民身份不仅代表了法律和社会身份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个体文化背景的不同。文化背景被视为移民身份的核心组成部分，是理解移民在东道国社会中态度分歧的关键变量^[11]。移民通常带有其原籍国的文化价值、行为规范和社会认同，这种文化背景在移民的代际之间可能发生转变或延续^[12]。因此，移民身份不仅与个体在法律上的地位有关，更涉及其在东道国的文化认同程度。

为了衡量文化背景对移民态度的影响，本文通过父母的移民身份来区分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具体而言，本文综合“父亲是否是移民”“母亲是否是移民”两个问题，将样本划分为三种类型：(1)父母均不是移民的“本土家庭”；

(2)父母一方为移民的“半移民家庭”；(3)父母双方均为移民的“移民家庭”。这一分类方法能够在控制法律身份相似性的前提下，更加精准地揭示文化背景在代际传递中的重要性。

选择这种分类方式的另一个理由是，现有研究表明，第二代移民虽然在法律身份上与本土居民相似，但由于文化背景的传承，他们可能仍然保留部分原籍文化认同^[13]。这种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可能导致第二代移民在看待其他移民时表现出与本土居民不同的态度。第二代移民由于文化认同的多样性，可能对来自相似文化背景的移民群体持更积极的态度^[14]。相反，第一代移民则可能因为自身的经济融入困难或文化适应问题，对新移民产生排斥或竞争性态度。因此，同时对比一代移民与二代移民的结果，有助于增加实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在分析移民群体对其他移民看法的研究中，本文除了使用基本的人口统计学指标外，还选择了多种涉及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态度的控制变量，以更全面地捕捉移民身份与其社会态度之间的关系。这些变量包括经济平等观念、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男女平等态度、对少数性别平权的看法以及政治积极性。这些变量的选择旨在排除不同价值观和政治立场对移民态度的混淆效应，并进一步揭示移民身份对态度的独特影响。

为了有效控制移民身份对移民态度影响的潜在混杂效应，并确保不同群体之间在比较时的可比性，本文采用了倾向值加权(Propensity Score Weighting, PSW)的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倾向值加权是一种基于倾向值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的方法，能够通过对样本中个体的特征进行加权处理，使不同群体之间在关键特征上更加平衡，从而消除潜在的混杂因素对数据结果的影响。在移民研究中，倾向值通常由样本中个体在上述控制变量中的特征得出。通过对这些特征进行加权处理，倾向值加权能够有效减少不同群体在观察性数据中的初始不平衡性，使得后续的数据分析更加稳健^[15]。在本文的研究设计中，分别针对本地居民和移民两个群体计算倾向值，并进行加权处理。对于每一个个体，我们根据其是否为移民身份，将其倾向值作为权重进行调整。这种加权方式能够确保移民群体与非移民群体在其他控制变量上的特征分布更加接近，从而使得研究能够在相似条件下对本地居民与移民群体的态度进行公平比较。此外，倾向值加权能够帮助研究者处理复杂的样本特征分布，特别是在非对称样本中进行分析时，通过赋予占少数的移民群体更高的权重，使其在分析中的影响力与本地居民群体更加接近，从而避免因样本量差异导致的分析偏差。

三、数据结果

从人口统计指标来看，样本中的各项指标分布合理。按照年龄分布来看，样本中受访者的年龄介于18—8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1.44岁。这表明本研究的受访者包括了年轻、中年及老年群体，可以在分析中较好地控制代际差异对移民态度的潜在影响。在收入和教育水平上，样本的平均收入为5.46，而教育水平均值为4.34。这表明受访者的收入和教育分布较为平均，且大多数人处于中等收入和教育水平。这两个变量是衡量个体社会经济地位(SES)的核心指标，现有研究表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个体通常在移民议题上表现出更高的包容性^[16]。

①回归结果为全部控制变量参与。

此外，研究中还引入了多个反映个体社会文化与政治态度的连续变量，这些变量的均值与标准差表明样本中存在明显的社会文化态度分歧。例如，关于男女平等的平均得分表明样本中大多数人对男女平等持相对积极的态度。这种态度分歧可能会进一步影响他们在移民议题上的看法，因为性别平等与移民政策立场之间往往存在显著的相关性^[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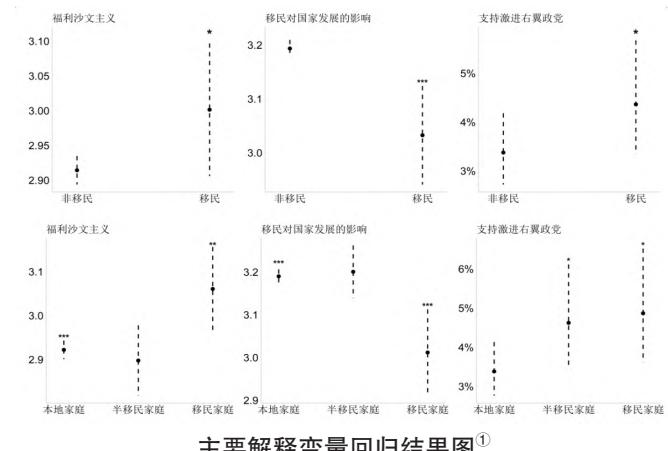
这些控制变量的引入能够有效地排除多种混杂效应，从而确保移民身份与移民态度之间关系的稳健性。本文通过引入对经济平等、政治立场和文化价值观的态度变量，能够更加全面地分析移民身份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对移民态度的影响，并揭示其背后的潜在机制。进一步的分析将基于这些控制变量，检验第一代与第二代移民在移民态度上的分歧，并探讨移民身份、代际文化传承与社会价值观在态度形成过程中的交互作用。

表2 各个变量描述性统计

连续变量	标准差	均值	案例数量
年龄	16.80	51.44	14 719
收入	2.93	5.46	14 719
教育水平	1.92	4.34	14 719
经济平等	2.52	5.45	14 719
政府与经济发展	2.07	5.03	14 719
男女平等	2.15	3.6	14 719
同性平权	2.78	8.09	14 719
政治积极性	1.62	7.84	14 719
福利沙文主义	1.31	2.92	14 719
移民的影响	0.95	3.2	14 719
分类变量		各项占比	
性别		男 51% 女 49%	
支持激进右翼政党		激进右翼政党 92% 其他 8%	
移民(第一代)		移民 10% 非移民 90%	
移民(第二代)		移民家庭 11% 半移民家庭 7% 本地家庭 82%	

1. 移民排斥移民

通过分析实证结果可知，移民群体与本地居民在福利沙文主义、移民对东道国发展的看法及其政治行为上的差异(见下图)。研究结果表明，与本地居民相比，移民群体不仅在移民福利政策上表现出更高的排他性倾向，而且在看待移民对东道国的总体发展影响上也更加悲观。此外，移民群体对激进右翼政党的支持度显著高于本地居民。更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排外态度不仅体现在第一代移民中，也在第二代移民中得到延续。这一结果与传统观点相悖，即移民身份并未使移民群体对其他移民发展出更强烈的同情心，而是形成了相较于本土居民更明显的排斥情绪。



移民群体在福利沙文主义态度上比本地居民更加倾向于主张对移民采取严格的福利分配策略。这种现象可以通过移民群体在东道国社会中所处的边缘地位及其对社会资源的竞争进行解释。移民群体往往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处于相对劣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低端劳动市场中与本地居民竞争时，更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冲击^[13]。因此，移民群体为了保护自身的经济安全感，可能采取一种排他性的策略，即在福利分配上主张对其他移民群体采取更严格的限制。这种自我保护性动机能够解释为何移民群体在面对其他移民时，表现出相较于本地居民更高的福利沙文主义倾向^{[6][26]}。同时，移民在东道国社会中往往遭遇歧视和社会排斥，这使得他们对福利资源分配的敏感性更高^[12]。移民群体在自身难以获得社会福利的情况下，更可能对其他移民群体的“竞争性”福利需求表现出负面态度，从而形成内部的资源排斥。这一点在移民身份的二代传递中得到延续，移民家庭的子女，即第二代移民，由于从小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也可能发展出类似的排他性态度。

移民相较于本地居民更倾向于认为移民对东道国的发展不利。这一结果看似与“移民身份认同”相矛盾，但实际上能够通过文化适应和社会整合理论来解释。根据文化适应模型，移民在东道国社会中常常面临文化认同和社会适应的双重困境。第一代移民由于在文化上无法完全融入主流社会，可能产生文化隔离感和社会疏离感，从而导致他们对东道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持更悲观的看法。同时，这种消极态度在第二代移民中并未得到完全消解。尽管第二代移民通常在语言和文化认同上更接近本地居民，但他们在社会整合和经济上仍然面临一定的障碍^[14]。社会整合的失败可能使他们对东道国社会的发展持更为复杂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可能认为自身融入主流社会的机会有限；另一方面，他们对东道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政策感到失望。因此，这种不满情绪反映在对移民整体影响的看法上，表现为对移民对东道国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否定。

研究结果还表明，移民群体在政治行为上比本地居民更倾向于支持激进右翼政党，这一现象具有重要的政治学意义。激进右翼政党通常以反移民、民族主义和排外政治立场为其核心动员策略，而移民群体对这些政党的支持，表面上似乎与其身份利益相悖。然而，这种支持可能是移民群体在文化适应失败和社会排斥感增强的背景下，对自身身份和社会地位进行再定义的结果。具体来说，移民群体，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移民，可能将激进右翼政党的反移民立场视为一种“反精英”或“反现状”的表达方式^[18]。这类政党通过将移民问题与社会经济不平等、文化认同危机挂钩，吸引了那些在东道国社会中感到被边缘化的移民群体^[8]。因此，移民群体对激进右翼政党的支持实际上是对其所处社会环境的一种回应，而非基于对其身份利益的直接认同。

第二代移民家庭相较于本土家庭也表现出更强的福利沙文主义倾向、更悲观的移民影响看法及更高的激进右翼政党支持度。这一结果表明，移民的某些政治立场和态度通过家庭环境在代际之间得以传递^[19]。移民家庭的文化背景可能在第二代移民中形成一种“文化断裂”现象(Cultural Dissonance)，即他们在文化上既无法完全融入东道国社会，

又难以摆脱家庭中对移民群体的消极认同。这种认同混杂可能使得第二代移民对移民议题持更负面的态度，从而在政治立场上表现出更强的排斥倾向。

进一步通过对移民群体内部特征的深入分析，本文发现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移民态度的重要变量。这些因素不仅决定了移民如何看待自身身份，还在他们对待其他移民的态度上产生影响。

首先，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移民表现出更强的福利沙文主义倾向。这一点可以通过相对剥夺理论(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来解释。当个体或群体感受到与他人相比自身处于劣势时，他们更容易产生不满和排外情绪^[20]。因此，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移民群体由于在就业市场和社会资源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容易产生对其他移民的敌对态度，认为移民不应与本土居民共享有限的社会资源。这一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更加显著，因长期面临经济压力，他们对社会资源分配的焦虑感愈发强烈^[21]。

表3 年龄与受教育程度对移民态度的影响

	移民身份		
	福利沙文主义	移民对国家发展的影响	支持激进右翼政党
年龄	0.001 0***	-0.007 8***	0.009 1
受教育程度	-0.023 2	0.065 5***	-0.126 8*
控制变量	✓	✓	✓
截距	1.954 ***	3.618 4***	-1.722 0

	移民家庭背景		
	福利沙文主义	移民对国家发展的影响	支持激进右翼政党
年龄	0.013 4***	-0.006 8***	0.015 9*
受教育程度	-0.031 1	0.079 7***	-0.133 8*
控制变量	✓	✓	✓
截距	1.907 8***	3.485 0***	-1.508 2

其次，受教育程度高且较为年轻的移民对移民问题的看法可能更趋积极。受教育程度高的移民，尤其是从事高技能或专业技术工作的移民，往往对移民的经济贡献有更深入的认识。因为这些移民可能已经看到了自己或其他高技能移民在技术创新、科研合作、经济增长等方面的贡献，因此，他们倾向于认为移民对东道国社会是积极的影响力量^[22]。这种看法源自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正面经验，特别是他们可能在跨国公司、科研机构或其他国际化组织中工作，接触到不同背景的移民，从而认识到移民不仅仅是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者，还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同时，受教育程度高且较为年轻的移民往往倾向于支持进步的政治立场，尤其是支持多元文化、社会平等和人权保护的政策。这些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通常与对移民的开放态度密切相关。相比之下，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移民可能更加关注短期经济压力和资源竞争，而高学历的年轻移民则更加注重长期社会进步和多样性的包容^[23]。

最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移民以及具有移民背景的受访者，往往是激进右翼政党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激进右翼政党通常以反移民政策为主要政治纲领，强调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及本土优先的社会福利政策^[24]。这种支持可以通过社会排斥理论来解释。社会排斥理论指出，当个体或群体感到被主流社会排斥或边缘化时，他们可能会寻求那些能够代表他们诉求并对主流政治表达不满的政治力量^[25]。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移民，尤其是生活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或从事低技能工作的移民，往往感受到更为强烈的经济不安全感和身份焦虑。这种焦虑感促使他们在政治选择上偏向那些能提供强烈排外诉求和社会保障承诺的政党^[26]。

四、结论与讨论

首先，移民和移民二代在福利政策上更倾向于福利沙文主义，即认为移民不应享有与本地居民相同的社会福利。他们主张减少对其他移民的福利支持，尤其在经济资源紧张的情况下，这种态度更加突出。这可以解释为移民群体面临的经济压力和社会竞争所导致的防御性反应——他们认为其他移民的到来会进一步削弱自己在东道国社会中的经济地位。其次，移民群体及其后代普遍认为，移民的到来会对东道国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在经济和社会稳定方面。移民群体的这一观点与本地居民相比更加明显，反映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确定性以及对资源分配的敏感性。这种消极看法可能与移民在融入东道国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文化冲突和社会排斥有关。再次，移民和移民二代相较于本地居民更倾向于支持具有排外民族主义立场的激进右翼政党。尽管激进右翼政党通常持反移民立场，但许多移民群体支持这些政党，表明移民并不总是与自己的身份利益一致行事。相反，经济不安全感和社会排斥感促使他们认同这些政党对资源分配和社会秩序的主张，视其为维护自身利益的途径。最后，本文还揭示了移民群体内部的态度差异。年长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移民群体，出于对经济地位和社会资源的焦虑，更倾向于支持排外的政治立场。他们认为，移民对东道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构成了威胁。而年轻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移民则持有相对积极的态度。他们往往看到移民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多样性方面的积极贡献，认为移民有助于推动东道国的发展。这些群体的态度差异反映了移民群体内部在文化适应、经济地位和社会融合过程中的不同经历。

本研究发现与以往的学术观点形成了反差。一般认为，移民群体基于共同的经历和身份认同，会对其他移民持更加支持的态度。然而，本文的研究表明，移民群体的态度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压力、社会排斥感、文化适应过程等。移民及其后代并不总是认同或支持其他移民，反而在某些情况下表现出比本地居民更强的排斥情绪。本文不仅为移民态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还揭示了更深层次的社会动态。这些发现表明，欧洲的移民群体并非一个同质化的群体，他们的态度受到其自身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背景、以及在东道国的生活经历的多重影响。这一研究有助于理解欧洲移民群体的复杂性。

参考文献：

- [1] Massimiliano Tani. Migration Policy and Immigrants' Labor Market Performance[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19, 54(1):35–57.
 [2] Giovanni Peri and Chad Sparber. Task Specialization, Immigration, and Wages[J].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adical Right-Wing Political Stances of European Immigrant Groups

Zhu Bingkun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amples of 11 European countries in the World Values Survey (WVS)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in immigration attitudes between the first- and second-generation immigrants and local residents in Europe by adopting three indicators, namely welfare chauvinism, immigration impact assessment and support for radical right-wing parties, and by using the propensity weighted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It has been found that immigrants and their descendant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local residents in terms of welfare exclusion tendencies, negative perceptions of the impact of immigrants, and support for radical right-wing parties.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rejection of older immigrants with low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s stronger, while the attitude of younger immigrants with higher education is relatively more open.

Key words: European immigrations; welfare Chauvinism; radical right-wing political parties

[责任编辑：师清芳]

-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09, 1(3):135–169.
 [3] Aflatun Kaeser & Massimiliano Tani. Do Immigrants Ever Oppose Immigration? [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3(80):1–15.
 [4] Edited by Karen Bird, Thomas Saalfeld and Andreas Wüst. The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of Immigrants and Minorities: Voters, Parties and Parliaments in Liberal Democracies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66.
 [5] Maria Engelmark. Extreme Right-Wing Voting Behavior: A Case Study on Swedish Immigrant Voters [D]. Linnaeus University, 2015.
 [6] Cas Mudd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7] Douglas S. Massey & Joaquín Arango etc.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3, 19(3):431–466.
 [8] Cas Mudde. Three Decades of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So What? [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013, 52(1):1–19.
 [9] Stephen Castles & Hein de Haas etc.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M]. Guilford Press, 2014:66.
 [10] Alejandro Portes & Rubén Rumbaut. Immigrant America: A Portrait (3rd Edition) [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99.
 [11] Richard Alba, Victor Nee. Remaking the American Mainstream: Assimilation and Contemporary Immigration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56.
 [12] John Berry. 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 [J].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1997, 46(1):5–34.
 [13] Rubén Rumbaut, Ages, Life Stages, and Generational Cohorts: Decomposing the Immigrant First and Second Gener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004, 38(3):1160–1205.
 [14] Min Zhou, Segmented Assimilation: Issues, Controversies, and Recent Research on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97, 31(4):975–1008.
 [15] Paul Rosenbaum & Donald Rubin,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in Observational Studies for Causal Effects [J]. Biometrika, 1983, 70(1):41–55.
 [16] Jens Hainmueller & Michael Hiscox. Attitudes toward Highly Skilled and Low-Skilled Immigration: Evidence from a Survey Experiment [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0, 104(1):61–84.
 [17] Shalom Schwartz. Value Orientations: Measurement,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Across Nations, in Roger Jowell & Caroline Roberts etc. Measuring Attitudes Cross Nationally: Lessons from the European Social Survey [M]. SAGE Publications, 2007:169–203.
 [18] Matt Golder, Far Right Parties in Europ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6(19):477–497.
 [19] Alejandro Portes and Min Zhou,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93, 530(1):74–96.
 [20] Jens Rydgren. Immigration Sceptics, Xenophobes or Racists? Radical Right-Wing Voting in Six West European Countries [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008, 47(6):737–765.
 [21] Moshe Semyonov, Rebeca Rajzman and Anastasia Gorodzeisky. The Rise of Anti-Foreigner Sentiment in European Societies, 1988–2000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6, 71(3):426–449.
 [22] Frédéric Docquier and Hillel Rapoport, Globalization, Brain Drain, and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2, 50(3):681–730.
 [23] Pippa Norris. Radical Right: Voters and Parties in the Electoral Market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89.
 [24] Hans-Georg Betz. 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M]. St. Martin's Press, 1994:90.
 [25] Hilary Silver. Social Exclusion and Social Solidarity: Three Paradigms [J].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994, 133(5–6):531–578.
 [26] Elisabeth Ivarsflaten. What Unites Right-Wing Populists in Western Europe? [J].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8, 41(1):3–23.